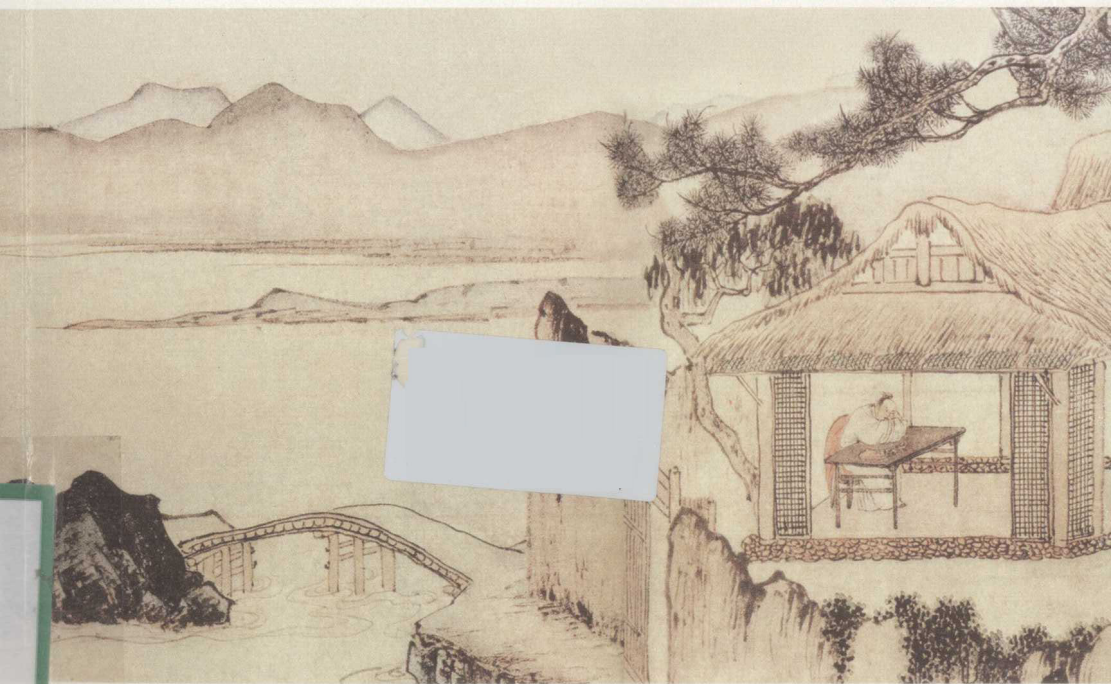


桐城派学术研究丛书

丁 放 主编

桐城文章与教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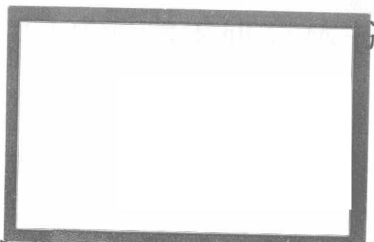
吴 微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

桐城文章与教育

吴 微 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桐城文章与教育 / 吴微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12. 6
(中国古代文学论丛)

ISBN 978-7-5664-0459-6

I. 桐… II. 吴… III. ①桐城派—文学研究 IV. ①I207.6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44252 号

本书得到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项目基金、
文学院安徽省 A 类重点学科项目基金资助

桐城文章与教育

吴 微 著

出版发行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安 徽 大 学 出 版 社
(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)
www.bnupg.com.cn
www.ahupress.com.cn

印 刷: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152mm×228mm
印 张:12
字 数:180 千字
版 次:2012 年 6 月第 1 版
印 次: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:29.00 元
ISBN 978-7-5664-0459-6

责任编辑:卢 坡
责任印制:陈 如

装帧设计:李 军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:0551-5106311

外埠邮购电话:0551-5107716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:0551-5106311

自序

结缘桐城已逾十年。相较于当年的寂寞,今天的桐城派研究已经今非昔比。粗略估计,以桐城派、或以桐城派作家为选题的硕博论文就有百余篇。加上千余篇的论文(论著),以及国家社科、教育部人文社科几乎每年一两项目的立项课题,因此,桐城派研究成为显学,已是不争的事实。

不过,长期以来,研究桐城派及其古文,着力于作家述评、流派考辨、文章技法、文学理论等“纯粹”文学研究层面,已成为“习见”之正途。从刘声木《桐城文学渊源考、撰述考》、姜书阁《桐城文派评述》,到吴孟复《桐城文派述论》,再到关爱《古典主义的终结——桐城派与“五四”新文学》等经典论著,其研究思路与方法大体如此,“系统”而“深入”。但面对前贤时俊的累累硕果,是步踵增华,一仍其“旧”,还是另辟蹊径,换一种写法,对后学者而言,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和考验。当然,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探求,后者可能更有收获和意义。

说也奇怪,自观照桐城堂庑,我就敏感于其中的教育神韵。或许是多年从教的感受,对桐城文人多朴厚、尚气节、敦廉耻的清纯人格,深为钦佩,对其文章的“通顺清淡”,叹赏之余,引之为范。陈衍曾垂训门人:“方姚之后,文法大明,作文甚易。”在我看来,桐城派为文强调“义法”、“雅洁”,与其教书育人之旨,紧密相连。他们考虑更多的是:如何使弟子学有所成,修身养性,立身济世。没有大言欺世,抛弃高深莫测,以有序有物、剪

裁得体的“桐城家法”，课徒授文，编选教科书。这样的文学、文化教育活动，不仅有自家学术追求，而且使弟子文章写作有法可依，有规可循，有文可仿。借力其训练，文史功底自然扎实深厚，学养学识亦日积月累，陶冶而成。我以为，这样的老师当然是负责任、有情怀的导师。桐城派之所以影响深远，在我看来，教育实乃“制胜”之秘。

如此说来，从教育入手，解读桐城文章，的确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由硕士论文的意识朦胧与浅尝辄止，到博士论文的自觉深入与沉潜涵咏，“教育”始终是我研究桐城派的一条主线。本书编选的两组文章，或多或少地富有“教育情怀”，就是这一叙述方式的记录和印证。

只是，前后相隔十五年，并非成于一时的文章，写作时的学养、思路、心境乃至文笔，都有很大差异。重新检点，不惬人意处甚多。编选起来，踌躇再三，左右为难。好在这些论文全都为公开发表之作，即使有心护短，也无济于事。尽管顾及“形象工程”，但当年的稚拙和偏颇，实在是行进途中难免的蹒跚。一个真实的自我，不仅反映了自身研究在趣味、境界、技法和深度上的嬗变，而且在更深层面，印证了当今学界桐城派研究资源拓展和方式丰富的现状。“众声喧哗”，左右穿插，更易触摸历史，返回现场。于此，对那些有志桐城的年轻朋友，或许有所启迪。于此，或许更能获得方家的认同和理解。毕竟，“知识共同体”中，“知识考古”者，大都心有灵犀，别有幽怀。

吴 微

2011年12月18日

目 录

CONTENTS

001 / 自序

001 / 上编:回望桐城

003 / 第一章 从“古文选本”到“国文读本”:桐城文章与文学教育的转型

一、“有所法而后能,有所变而后大”

——古文选本的文学功能……004

二、“得上探古人之精神,资以演进耶”

——国文读本的教育转型……018

034 / 第二章 从亲和到遗弃:桐城派与京师大学堂的文化因缘

一、桐城与大学堂的文化亲和……034

二、嬗递的北大与落伍的桐城……040

047 / 第三章 耕读的远逝与古文的失落

——桐城文章的传承裂变

一、耕读乡风与桐城古文……047

二、教育转型与古文失落……052

062 / 第四章 雅洁:桐城派的修辞理念

一、雅洁:“义法”的衍生和体现……062

二、雅洁:文品与人品的统一……065

067 / 下编:阅读大家

069 / 第五章 姚鼐的文化理念与古文创作

一、姚鼐的文化理念与心理建构……069

二、姚鼐古文的风貌特征……081

三、姚鼐古文的文化定位……087

100 / 第六章 “西学”的输入与晚清古文的新变

——郭嵩焘外交日记《使西纪程》的文化解读

一、古文高手与洋务大员……101

二、“放大”古文与“通知洋情”……104

三、流布士林与“因文贾祸”……110

117 / 第七章 桐城光焰自是而熠

——吴汝纶与桐城派古文

一、“幸生桐城”……117

二、“文非吾之至者”……121

126 / 第八章 “旧学”的延伸与“新学”的尝试

——吴汝纶《东游丛录》“教育之学”的文学书写

一、“旧学”与“新学”的教育接轨……126

二、“教育之学”的文学书写……132

140 / 第九章 桐城文章的“别样风景”

——以严复、林纾的翻译为中心

一、从几则“告白”谈起……141

二、游走边缘的古文……143

三、别无他途的译述工具……146

四、“场屋秘本”与“国文读本”……151

五、成亦萧何，败亦萧何……155

161 / 第十章 “小说笔法”：林纾古文与“林译小说”的共振与转换

一、堂皇入室的“小说笔法”……162

二、“小说笔法”和古文的共振与转换……166

169 / 附 录

一、近二十年桐城派研究述评……169

二、文学教育：中学与大学该怎样递进……175

三、秉“了解之同情”持实证“得其微旨”

——张俊才教授《林纾评传》读后……178

183 / 后 记

上编：回望桐城

第一章

从“古文选本”到“国文读本”： 桐城文章与文学教育的转型

文学、文化的传承与嬗变，教育至关重要。这在具有丰厚文史传统的古代中国，显得尤为突出。孔夫子，倘若没有三千弟子、七十二贤人鼓吹师说，恐怕难有儒学大宗。韩愈正因祭酒国子监才得以传道授业、引领诸生，张古文运动大旗，由此而泽慧文坛千年。正因如此，古代文人士大夫莫不重视身传言教，如何将自家著述、平生最得意处传钵弟子，几乎是每一位圣哲仁贤所兢兢业业之事。就文学史而言，就文学流派而言，两千年中以教育维系生命纽带的莫过于桐城派。自方苞、刘大櫟、姚鼐起，桐城文人大都职为教师，乐为人师，辗转各大书院，倾心教育，环环相扣，薪火相传，英才辈出。乐于执教、善编“选本”（教科书）、安身书院（学校）成了桐城派独特的文化符号。应该说，正因如此，桐城派的传衍才得以拓开空间，突破地域，蔚为大观。王先谦在《续古文辞类纂·例略》中描述其景象曰：

自桐城方望溪氏以古文专家之学，主张后进。海峰承之，遗风遂衍。姚惜抱禀其师传，覃心冥追，益以所自得，推究闾奥，开设户牖。天下翕然，号为正宗。承学之士，如蓬从风，如川赴壑，寻声企景，项领相望。百余年来，转相传述，遍于东南。由其道而名于文苑者，以数十计，呜呼，何其盛也。

观照文学教育，就受教者而言，教师的讲授、教科书（选本）

的选定、学校(书院)的类型是不可或缺的三大关注重点。其中,文学教科书(选本)较之文学教育其他要素,社会关注度更高。这是因为,其一:教科书具有超越时空、突破地域、传播久远的特点。求学者可以无缘名校优游,无缘名师亲炙,但一旦拥有心仪之教科书(选本),一样可以揣摩涵咏,私淑之而得其神韵。这在古代私塾教育体系中实为常态,曾国藩私淑姚鼐就是典型一例。其二,教科书既是知识、技能的载体,也是文化观念、思想的载体。文学教科书(文学选本)显然积淀了编撰者独特的文学趣味和文化意识。广为流行的“古文选本”或文学教科书无疑代表了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倾向,蕴涵着历史行进中的价值取向和文化选择。因此,文学教科书(选本)的变化,不只是文学教育嬗变的呈现,更表明了文章功能的变化,文学审美的变化,并由此而昭显社会文化的变迁。

回望桐城文派,可以发现,桐城文人对此有着超越常人的敏感和专注。其“古文选本”系列对清代的文学教育,影响深远,人所共知;桐城文派据此而传承百年。而当西风东渐,桐城文人又一度引领风潮,踞守文化中心。但文学教育的现代转型,“转益多师”的结果,也使得桐城文章传承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境遇。因而桐城文人在新的历史境遇中所编纂的“国文读本”系列,在晚清以降的教育转型中同样显得独树一帜,别有意味。由此,本文从教育入手,结合书院(学校)的授受历史变迁,以文学教科书(选本、读本)为切入角度,解读新学兴起与桐城文章变化的内在关联,讨论由此所昭示的传统文学、文化困境。

一、“有所法而后能,有所变而后大”

——古文选本的文学功能

桐城派的文学教科书,以1905年科举制废除为界线,分为前后两个时期,前期是“古文选本”,以《古文辞类纂》为核心;后期是“国文读本”。林纾、吴闿生、吴芝瑛等均编有此类学堂国文讲授之读本。

在“古文选本”系列中,下列选本当为代表:

方苞编选的《古文约选》,姚鼐编选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曾国

藩编选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，黎庶昌、王先谦分别编选的《续古文辞类纂》。除此之外，吴汝纶还编有大量的古文评点本和节选本。通过这些古文选本的纽结，“桐城家法”得以播扬，而桐城文章的嬗变也得以印证和昭显。换言之，桐城“古文选本”系列的嬗递，其作用就是使桐城弟子“有所法而后能，有所变而后大”^①。因此，“从头说起”，以史家之眼光，探究“桐城选本”文化，当是寻绎上述“选本”的最佳路径。

作为桐城始祖，方苞为桐城派奠定的理论基石就是“义法”说。他在《又书货殖传后》第一次提出了古文“义法”说，以“言有物”、“言有序”之“义”与“法”，要求文章写作“义以为经而法纬之，然后为成体之文”。方苞“义法”说，“汲取了先秦以来史传文、古文写作的理论成就与经验，也融入他自己读书、写作的感受与体悟”^②。在方苞看来，古文写作的法则，同样也适用于时文写作。因此，他在应和硕果亲王允礼编选《古文约选》时，即据此原则取舍范文，作为“制举之文”之准的。他在《古文约选序例》中云：

盖古文所来远矣，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，其根源也。得其枝流而义法最精者，莫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，然各自成书，具有首尾，不可以分割。其次《公羊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，虽有篇法可求，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，学者必览其全，而后可取精焉。惟两汉书、疏及唐宋八家之文，篇各一事，可择其尤，而所取必至约，然后义法之精可见……学者能切究于此，而以求《左》、《史》、《公》、《谷》、《语》、《策》之义法，则触类而通，用为制举之文，敷陈论策，绰有余裕矣。

古文义法既然旁通于时文，那么古文写作训练自然有益于时文写作，有益于科举考试。在八股取士制度笼罩下的文学教育，“承学之士，必治古文”。古文成为士人学子必备的文化修

① 姚鼐著，刘季高标校：《惜抱轩诗文集·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2年。

② 关爱和：《古典主义的终结》，第29页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1998年。

养和文学技能。具有授徒课文与四试科第之人生阅历的方苞，对于私塾教育“教科书”的“杂乱”状况，对于士人学子古文与时文写作训练茫无舟楫之窘态，既了然于胸，也感触良深。“近世坊刻，绝无善本，圣祖仁皇帝所定《渊鉴》古文，闳博深远，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”。基于此种考察，方苞“乃约选两汉书、疏及唐宋八家之文，刊而布之，以为群士楷”。这里，非常明确地表明其《古文约选》是为莘莘学子初学古文提供入堂“门径”和写作“津梁”。一言以蔽之，即为“初学者示范”。为此，他在例言中谆谆告诫：“三传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、《史记》为古文正宗。”“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春秋》及《四书》，一字不可增减，文之极则也”。“唯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，俾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，然后可溯流穷源，尽诸家之精蕴耳”。这样，他就为初学古文者构建了一个可资效仿的古文文统：四书五经、周秦诸子、左史八家。于是，桐城文统亦由此成立。例言中再三致意的还有“义法”：“子长‘世表’‘年表’‘月表’序，义法精深变化，退之、子厚读经、子，永叔史志论，其源并出于此。”“序事之文，义法备于《左》、《史》，退之变《左》、《史》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，永叔摹《史记》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，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”。由此，桐城派理论基石之“义法”说，再次被倡扬，并由所选定的古文篇目得到确认和体现。而另一理论基石“雅洁”说，方苞在例言中也有所申论：“古文气体，所贵澄清无滓。澄清之极，自然而发其光精，则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之瑰丽浓郁是也。”这样，桐城文统与“桐城家法”两大基石“义法”说、“雅洁”说，均由例言而得以阐明，虽名曰“为群士楷”，但桐城门户却悄然而现。

不仅如此，方苞还视古文写作为一种人格修炼。其《古文约选序例》中云：

虽然，此其末也。先儒谓韩子因文见道，而其自称则曰：“学古道，故欲兼通其辞。”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旨，而得其所归，躬蹈仁义，自勉于忠孝，则立德立功，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，皆始基于此。

在方苞看来,文学教育中的古文写作,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文章修养操练之必修功课,而且是忠孝仁义之儒家人格之文化养成,是一种道德修炼历程。由于《古文约选》原为八旗官学学子所编选的古文范本,因而具有官修教材的意味。乾隆三年(1738),《古文约选》等书被官方认定“具于学术有裨,自宜广为传习”,因而诏令“坊间有情愿翻刻者,听其自便”,“听人刷印”^①。在官方的推助下,民间书坊得以大量印行。《古文约选》由此广为传布,成为当时私塾教育中学习古文写作的正宗范本和科考必备书。其以古文为时文,以清真雅正为正途楷模,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那个时代的文学教育。得力于官助,虽说无以骄傲,但因此而深刻地影响了那时的科举文化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方苞《古文约选》高人之处在于,明明是为举业而为,但却以纯粹之古文而范之,授徒悬的之教育眼光明显高出侪辈。作为桐城古文选本之先声,虽然不免粗糙与取径狭窄,但在当时,确为初学者最好的选本。因而一直为桐城后人所津津乐道。

继承并光大方苞“古文选本”最成功者是姚鼐的《古文辞类纂》。

说其继承,是因为《古文辞类纂》至少在两个方面与《古文约选》神理相通、一以贯之。其一,遴选文章之趣味大体一致。《古文约选》只收两汉、唐宋八家文章,共计357篇,其中两汉文45篇,唐宋八家文312篇。而《古文辞类纂》收文770篇,虽然较《古文约选》扩充一倍多,但主体部分仍是两汉文(130篇)、唐宋八家文(509篇),而且方苞所选之文,不少也被姚鼐辑录。由此可见,方、姚不仅文学趣味前后相通,而且授徒课文之文学教育眼光亦大体叠合。与此息息相关,其二,方、姚之选本路径大体相近。《古文辞类纂》遵循《古文约选》之溯源六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,推求《左传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公羊》、《谷梁》、《国语》、《国策》之义法作为古文路径;同时,姚鼐由此扩而广之,切究两汉古文、唐宋八大家,并辑录明代归有光,清代方苞、刘大櫆的古文,作

^① 参见素尔讷等撰:《学政全书》卷四《颁发书籍》,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828册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。

为初学古文者之范文。选本路径的方向大体一致,显示出桐城派标举的文统已经形成。桐城文派,亦因此山高水长。

而言其光大,则《古文辞类纂》较之《古文约选》堂庑广大,去取精严,文学眼光和教育理念显然高出一筹,为一时之冠。以至于百余年后吴汝纶还赞叹:“《古文辞类纂》一书,两千年高文略具于此,以为六经后之第一书。”^①作为桐城派开派的关键人物,姚鼐编纂此书,用意颇深。

首先,开宗立派,须有书为证。为此,姚鼐在《古文辞类纂序》开篇即称:

鼐少闻古文法于伯父薑坞先生及同乡刘耕南先生,少究其义,未之深学也。其后游宦数十年,益不得暇,独以幼所闻者,置之胸臆而已。乾隆四十年,以疾请归。伯父前卒,不得见矣。刘先生年八十,尤喜谈说,见则必论古文。后又二年,余来扬州,少年或从问古文法。夫文无所谓古今也,惟其当而已。得其当,则六经至于今日,其为道也一。知其所以当,则于古虽远,而于今取法,如衣食之不可释;不知其所以当,而散弃于时,则存一家之言,以资来者,容有俟焉。

这里有二层含义:一是先叙姚鼐本人之古文法得之于伯父薑坞先生和老师刘大櫟先生;言外之意,“所闻习者”渊源来自桐城先祖,并非自己的闭门造车和心血来潮;桐城文派客观存在于这一渊源之中。二是编纂此书的起因,乃“余来扬州,少年或从问古文法”。即姚氏主讲扬州梅花书院之时为答弟子问而编此书。传道授业解惑,乃为师之道。但姚鼐此处并非单纯“解惑”,联系上文之叙述渊源,其文派建构意味已委婉显现。再阅读早于此文三年(1776)而撰写的《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》,可以明了,姚鼐已借“寿序”阐明了方苞、刘大櫟及其本人与方、刘的师承脉络和文统谱系,桐城派已经“呼之欲出”。因此,三年后的编纂此书、作此序言,实则就是藉此更明确地彰显桐城

^① 《尺牍·答严几道》,《吴汝纶全集》(三),第231页,黄山书社,2002年。

派文统。毕竟,有教科书张扬旗帜,比空洞的说辞要实在,而且有说服力和感召力。姚鼐的“老谋深算”很是高明,也很有文化魅力。果然,“始惜翁先生为此书成,门弟子多写其目或录副去,”流播极广^①。桐城派由是而立。

其次,编纂此书,规模古文写作,拓宽阅读视野,提升审美功能。作为教授古文的“教科书”,只有有益于学生领略古文辞的佳妙,并且得以学步轨辙,才能服膺众人,沿溯源流,承绪文统。撰成于扬州梅花书院的《古文辞类纂》,显示了姚鼐的匠心独运。他改变了前人古文选本繁复、淆乱和庞杂的文体分类,更不取方苞选本不分类的范式^②,而将文体归并为十三类;并逐类阐述了其渊源、特点、功用及代表作品和选录标准。文体的删繁就简,使得各类文章的功用性大大突出。诸如论辨、序跋、奏议、书说、赠序、诏令、传状、碑志、杂记、箴铭、颂赞、辞赋、哀祭类这些文体,在当时几乎都是适用性、针对性很强的应用文体。姚永朴《文学研究法·门类》曰:“欲学文章,必先辨门类。门者,其纲也;类者,其目也。”纲举目张,“辨别体裁,视前人乃更精审”的姚氏分类,简明恰当,确实便于学生学习和掌握。学以致用,这一古老的教育箴言,是这一分类广为流播和接受的最好诠释。

将“古文”扩而广之为“古文辞”,是姚氏的一大发明。方苞《古文约选》只选古文,不选诗歌、辞赋;以现代文学术语指称之即是纯粹的“古典散文”选本;鲜明地反映了方苞所谓的“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,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,汉赋中板重字法,诗歌中隽语,南北朝史佻巧语”^③的作文雅洁主张。虽然将古文纯而粹之,较若干前贤文章选本(如《昭明文选》、宋人姚铉《唐文粹》等)诗文并收,在文体分类上有所厘清;但限制过多,对古文

① 姚椿:《晚学斋文集》卷三《古文辞类纂书后》,咸丰二年刊本。

② 如《昭明文选》文体分为三十九大类,大类下还有小类。宋人吕祖谦《宋文鉴》分为五十八类。明人吴讷《文章辨体》分为五十八类。明人徐师曾《文体明辨》则分为一百二十一类。庞杂不堪。

③ 参见《方苞集》附录之沈廷芳《书方望溪先生传后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。